



论初唐诗人的生命意识

陈燕妮

摘要：生命意识是初唐诗人群体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在对汉魏生命意识的总结中，继承了人类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这种追求因盛世的到来变得更为急迫，却往往因个人际遇而无法把握，从而流露出个体生命之悲。进而，他们将个体的生命和群体的生命放在历史的时间流中，与宇宙对话，探求并最终获得与永恒的同在感。

关键词：初唐；诗人；生命意识；流变

唐代文学以唐诗作为时代文学的代表，通常被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分别以风骨顿起、兴象玲珑、奇崛妙丽、衰飒悲凉的风貌呈现出渐变趋势。其中初唐是一个为文学盛世到来酝酿氤氲气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文学一方面因内部规律的律动，一方面因时代氛围的推动，在文学的理论、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唐代文学的黄金时期做好了准备。众所周知，唐代文学最摄人心魄的特点即在于“盛唐气象”。而创造出这种气象的创作主体唐代文人在无可匹敌的时代下，拥有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作为个体的生命所进行的一种理性思索以及情感体验，是个体的人开始意识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因而引发对个体生命在长度上进而在质量上的关注，及在情感上或紧张、或悲怆、或豁达、或颓废等相关感受。正是有了“生命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人才区别于其他生灵，并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存在。

“生命意识”可以说是初唐文学中重要的一环，承接汉魏以降的思考而来，在其基础上又因新朝气象有了新的认知。本文拟对初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初唐四杰”、陈子昂、刘希夷、张若虚的生命意识及其流变过程作出探讨。他们在新朝风气中，或对汉魏以来的生命意识作出总结和呼应，或在时代风云中生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生命焦虑感，或在与宇宙的对话中获得生命圆融之感，将对生命意识的体认达到一个与宇宙同在，不缺不失的高度，从而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做好了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准备。

一、初唐诗人对汉魏至唐生命意识的总结

汉魏以来，生命意识常常成为文学中一个主要的命题。因为处在末世（东汉末年）或者乱世（魏晋），风衰俗怨，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更兼政治压抑等社会现状，士人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生命完整的关注尤为突出。总体来说，他们的生命意识可分为如下几种：一是在时空中或社会情势下对个体生命短暂的清醒认识，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又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古诗十九首之回车驾言迈》），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这是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同时又因为政治迫害或黑暗，而多有忧生之叹，如曹植在“任城王薨”后，有“大别”之意，生出“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之感。

(曹植《赠白马王彪》)。魏晋时期以阮籍为代表,在司马氏政权的险恶形势下,“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作八十二首《咏怀》诗,“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李善《文选》卷二十二)。二是对追求生命延长而服食药石求神仙这种做法的理智认识,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又如“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古诗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曹植《赠白马王彪》)。三是面对个体生命短暂客观事实而及时行乐,如“……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之驱车上东门》);“昼知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诗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四是对被视作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功名荣华的追求,如“……立身苦不早……荣名以为宝”(《古诗十九首之回车驾言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之今日良宴会》),“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陆机《猛虎行》)。五则抛弃社会价值观,以隐居田园的生活方式来获取生命的舒展和自由,可以说是提升生命质量的一种途径,以陶渊明为代表。如“……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又如“……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汉魏时期可以说是人生命意识觉醒进而到自觉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人对生命的长度和质量进而本质都有了不同方向的探求。到了初唐,唐人对汉魏以来生命意识有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集中体现在“初唐四杰”之卢照邻笔下的《行路难》中。他主要就生命长度这个主题进行了感慨和总结。

卢首先将眼前的长安繁华置于一个沧海桑田式的状态中,以此时已经“枯木横槎卧古田”的古木作为盛衰更替物化的一个见证者起兴。接着,卢以一种极端亢奋的情绪和极度密集的节奏叙述了这株古木盛时的境况,隐喻着城市中曾经繁华的人事。至于“巢倾枝折风归去,条枯叶落狂风吹。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处,转向对生命短暂的叹息,“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延续了汉魏以来对个体生命短暂的体认。接着他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和总结。首先是对汉魏以来,追求功名以作为个体生命价值实现,进而妄求延长生命长度的这种方式进行了批判和总结。“汉家陵树满秦川,行来行去尽哀怜。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拟荣华一万年。”他们希冀生时富贵功名延续到地下,绵延千年。从不少汉墓室中与地上世界种种的同构都可感知到这种极力希望长生的生命意识。而曾经富贵干云的功名荣华并不能延长生命,“不见朱唇将白貌,惟闻素棘与黄泉”。其次是对汉魏时期欲加强生命质与量,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进行了肯定,“金貂有时须换酒”。“酒”是魏晋时期文人在恶劣的政治情势下,对现实被迫作出的一种回应,进而成为追求生命质量的一种途径。酒帮助这些乱世中的文人在最大可能的情况下,远离人生现实中种种忧患和烦扰,使思想突然失去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地舒展开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生命从质到量的一种追求。第三是对汉魏时期以药石求神仙来延长生命这种方式的终极否定。上句“玉麈但摇莫计钱”先肯定了这种方式。“玉麈”是魏晋文人追求生命长度方式的一种体现。魏晋人好服食药石以求长生。这是道家生活的一种表现。而在药石的作用下,他们的身体受到了一些限制,以至于以清谈玄理作为相伴生的生活方式。“玉麈”便是清谈相伴随的,以示“魏晋风度”的一种工具。服食药石也是求仙的一种途径,而求仙并不可期,“寄言坐客神仙署,一生一死交情处。苍龙阙下君不来,白鹤山前我应去。云间海上邈难期,赤心会合在何时”。纵使生死交情,而最终都将先后归于大化。至于传说中向云间海上求取的仙丹良药,都未可知。卢照邻就是因服丹中毒,最终不堪所苦,自投颍水而亡。可知他未必不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道出此中感受。而道家中的转世说更是不可预料。最后他对生命长度作出了一个健康长寿期许的同时,肯定了魏晋时另一种追求生命本质的生活方式,“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巢由”是古代的隐士。而魏晋时期也隐逸成风,在某种程度上和“酒”一样,都有着远离世间礼教束缚的自由意义,从而来加强生命的质量,获得更长的舒展生命。卢本人就曾先后隐居太白、具茨山中。

总体来看,卢对汉至魏晋的生命意识做了几乎全面的分析和总结,都落在如何加长生命长度这点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都灌注着他对人生的苦苦留恋,而这种留恋在于盛世对他的诱惑,他却因个人遭际不得恣意加入其中,而平生苦恼和叹息。

二、初唐诗人生命意识中的焦虑

卢对汉魏以来的生命意识在总结之余,仍然可见其在不遇和身体苦痛中对生命长度不甘的追逐。这正是初唐人对生命意识的典型思考。

(一) 治世中的功名焦虑

卢照邻的时代初唐在他笔下呈现出治世的清平局面,“千年圣主应昌期,万国淳风王化基。请比上古无为代,何如今日太平时。”(卢照邻《登封大酺歌四首》)太宗以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气度,和“国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召唤天下士子向长安涌来。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成功的可能,令人神往。孔子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篇》)。初唐士人对个体生命尊严和价值的认知热情空前高涨,捡拾起失落了近两百年的社会责任感去积极入世,欲向天下展示自我的天赋异禀。

在“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时代形势下,对功名利禄,功成名就的追求成为了时代的生命主题,而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首要便是边塞军功。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战败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①,如“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又如“平生一顾念,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骆宾王《相和歌辞·从军行》)

很多士人却往往空怀一腔报国热情,因为个人的际遇而无法实现自我的期许。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空前的时代,也认识到自我的才华所在,都急于在这个壮丽的舞台上一展个体生命的风采,而时不我与使他们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实现平添焦虑。

在卢另一首七言歌行《长安古意》中,可见出他对盛世到来,繁华不得参与,而生命短暂无从把握的焦灼感受。他以艳羡的目光和热切的笔触对长安大道的繁华做了歌咏。他书写着城中贵胄生活的同时,在潜意识中幻想着自己已成新贵,恣意到了极致,意欲用紫陌红尘中声色富贵充满生命,来抗衡须臾人生的短暂,“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而他不得不在理性中回到盛衰之不可抗拒的规律上来,“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他这种清醒的生命意识仍然是对个体生命在盛世不得参与,不得成功的悲哀体认。于是愈发加强了他对寂寞书斋中生命状态的否定,“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他否定了像汉代贤者那样以著书“立言”来获得不朽的生活方式。

他却因身体的疾病对生命不能提出一个积极的应对策略来。卢照邻因才华受到邓王爱重,后任调新都尉,却因染风疾而被迫去官。他不得不隐居太白山和东龙门山,后疾甚,足挛,一手又废。他本着强烈的入世之心,却因身体恶疾不得参与社会,不得不吞声绝此功名进取之心,“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明镜羞窥兮向十年,骏马停驱兮几千里。麟兮凤兮,自古吞恨无已。”(《释疾文三歌》之二首)他自比为麒麟和凤凰以及骏马这样的灵异之兽,而其个人际遇却如此令人嗟叹。

(二) 人生不遇的焦虑

在时代奔涌着盛世到来气息的同时,建功立业挟着爱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以最功利的方式出现在唐人面前。于是唐人在边塞诗派以群体的方式出现之前,就前赴后继地奔向塞漠,建立功业。杨炯仅仅是提出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而陈子昂则是真真正正地两次慷慨从军,随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跃马大漠南,后又随武攸宜军出击契丹。

陈子昂比起“初唐四杰”来说,要幸运得多。他曾受到武后的赏识,是他生命中的“遇”。而他因耿直得“遇”,也因耿直遭到“不遇”。他因生命中有了知遇之后,越发对生命中出现的“不遇”而倍加伤怀且急

①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

切，“兰若生春夏，苒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感遇》）他将自己以香兰杜若为喻，美好却只能幽独于空林之中，无奈地日日看昼成夜，乃至芳华凋落。正如同他的生命在闲置和不遇中，空负才华而无人赏识，忧伤而绝望。这种绝望在他随武征契丹的过程中，因言事被降职，被放大到了极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他此时和卢一样，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短暂，却在历史的舞台上无有入手之地，想要把握却无从把握。在空漠的时间之流中，逝者如斯夫，掬水在手，但见空流。

李泽厚先生说：“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满腹牢骚、一腔愤慨的，但他所表现的却是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它豪壮而并不悲痛。”^①卢照邻在病态的生命中和生死的罅隙间，只是表达着焦虑，未凸显出个体生命的位置。而陈子昂则在焦虑中将自己的个体生命放在历史之中，纵览古今来烘托自身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在忧思中有着极端的自负之意，意欲与历史时间同在。这便是他开创的生命意识价值所在，也是“豪壮而并不悲痛”的原因所在。

此外还有如骆宾王者，在《帝京篇》中以与卢相似的笔调铺写长安城市的繁华之后，感叹盛衰更替。虽然意识到个体生命对世界名利的占有有限，“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当时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却仍然以司马相如、扬雄、汲黯、公孙弘以及贾谊的典故对世间个体生命“遇”与“不遇”的主题作了无奈和不平的叹息，“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这未尝不是对他自己生命仕途艰难，怀才不遇的叹谓。他为宦十年不调甚至还被诬赃下狱，才华过人却只落得明堂县主簿这样的低级职位。他感叹不遇的同时，将自己与先贤作比，也是陈子昂式的生命意识，即对自己生命才华的认识和重视，方才有此盛世中生命之焦虑。

就是这个时代中的隐者王绩，同样在时代的夹缝中，在表面冷漠的态度下，也感叹着生命的不遇。他在隐居生活中并未与田园融为一体，常常“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他曾在《自撰墓志》中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五十，而无闻焉。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他一生三仕三隐，往往因“才高位下”而不屑进而玩忽职守。可见得他也因不遇而生落寞之意，引孔子言“四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论语·子罕篇》），也是在自负之余对生命无奈而焦灼的感受。

总之，卢照邻和陈子昂、骆宾王等人都意识到了生命短暂，意欲有所作为却不可得，并伴生了焦灼之感。这种焦灼感胜于魏晋时期多多。此世不同于彼世，初唐在社会的各方面都对士人提供了各种晋升的机会，刺激了士人参与的信心和勇气，因此产生的生命意识也更为迫切。

三、初唐诗人最终对生命意识圆融的体认

诱人的时代对初唐人的生命意识提出了一个苦恼的主题，即如何使有限的个体生命获得超越时空盛衰的永恒感。这样，个体生命才不必为一时的命运不遇而感到伤悲。

刘希夷同样体认到了这种生命之悲，但他找出了一种思维方式，试图平衡并化解了这种生命之悲。在他的名作《代悲白头翁》中，面对繁盛的洛阳城东桃李花，借洛阳女儿之口道出对盛衰须臾的思考和悲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果生命也能与时间同在，便不至于为一时一处外在的盛衰或者自身的起伏而心生所感。但事实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人无法永恒，因此才无法摆脱这种有限无法匹敌无限的悲哀。所以，通篇他肯定的是时间的永恒，生命的有限，于是在盛景中看到的是个体生命的，即衰亡。这正如“红颜子”的走向一定是“白头翁”，也正如他在《公子行》中感受到的伤心和断肠，“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这种悲哀来自于个体生命对盛况无法挽留的悲情，来自于个体生命不能与花事同在的伤怀。但是他在《公子行》中延续了这种悲哀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来与之抗衡，进而化解这种悲哀。他提出了人的情感可以永恒，在某种意义上，可与时间抗衡，“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他这种化解

^①李泽厚：《美学三书》，第132页。

的落脚点仍然是悲怆的,愿望抵不过形体的消散。但刘毕竟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方式,有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意味。

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同样提出了这样的生命叩问和应对之法,与刘不同的是,他是以乐观的纯美心境达到了对生命圆融的体认。他的叙述由眼前之月渐渐进入到宇宙之月的视角中,“……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进而他直接与宇宙寥廓中的永恒之月对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他并未对他的发问作出回答,只因月之无限和人作为个体的有限而无法回答。接着他将人的生存从个体提升到群体中,将有限努力化为无限,从而与月之无限相匹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在此,他的感触“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与刘“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恰成一个相反的态势。刘肯定的具有无限性的花事,否定的是具有个体性从而有限的人事;而张却肯定的是作为群体性的人的无限性和创新性,指出了月虽具无限性,但无有新意的有限性。他比起刘而言,肯定的是人作为群体的无限性这种生命意识。接着他将“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无情之月”逐渐化为被人类情感浸淫的相思之月。月因人类与亲友恋人的别离之苦而被赋予了相思之情。宇宙苍穹之下,春江明月之中,何处不是别离的扁舟子,又何处不是相思之人。从《诗经》中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到汉古诗的“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从魏晋时期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到唐人的“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从“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至“千里共婵娟”乃至于今天,这种相思因人的传承而永无断绝。至此,有限的人和无限的月在情感中渐渐融为一体。诗中多疑问词“何处”“谁家”“不知”“几人”等,作者并不拟回答,而是传达出与“何处春江无月明”一样的意味,即无处不在的对月怀古或相思之情,与月光同在,与永恒同在。而月可落,春可逝,但作为有限的人所拥有的情感在宇宙中永恒。

闻一多先生以为,“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爱情,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①这也是在印证人的生命意识与宇宙的交融。至此,唐人苦短焦虑的生命意识在此获得了圆融丰满的消解和体认,胸襟渐渐放开,与宇宙融为一体。

综上所述,初唐人的生命意识在诗人的群体思考和探索的笔下,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对汉魏生命意识的总结中,继承了人类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因盛世变得更为急迫,想要参与,却往往因个人际遇而无法把握,从而流露出个体生命之悲。进而,他们将个体的生命和群体的生命放在历史的时间流中,与历史对话,与宇宙对话,苦苦追究着如何能与永恒同在。至于《春江花月夜》,其中的生命意识是初唐诗人对生命思考的顶峰成果,即对永恒的圆融领悟。他们在对外界的观照中逐渐从生命的焦虑走向生命的自适自足,于是才能更进一步地肯定生命的价值所在,才能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现世之中,划下自我的印记。同时这也是时代气象的一种外泄,是雄浑一统“盛唐气象”的起点,是时代慢慢步向盛唐的流变结果^{②③④}。

●作者简介:陈燕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②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

③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④郭杰:《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内涵与泛化》,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